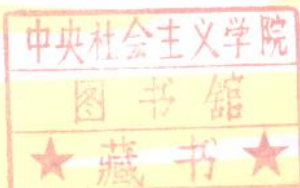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

高齐毅 主 编



中国人事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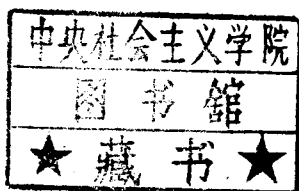
D61 / 58

77083

2213 / 10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

高齐毅 主编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89年·北京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

高齐毅 主编

*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黄寺大街乙一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32开本 9.375印张 221千字

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80076—010-3/D·009

定价:3.90元

77083

目 录

序	袁 木	1
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	王福如	4
十年来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论述	顾龙生	18
坚决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沈宝祥	35
马克思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	张启华	5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事业必定胜利	王超湘	75
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坚持两个基本点	范 康	9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政治	马仲良	108
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方法论的几个原则	高齐毅 刘 莹	127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及其发展	滕仲日	145
关于民主的若干问题	邱敦红	162
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范 康	174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高齐毅	192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	沈宝祥	235
全面理解“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	王立杰	256
从近百年的历史,看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常润华	274
编 后		292

序

袁 木

孙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可不可以这样说，研究国情、了解国情的过程，便是“知己”的过程。

这种研究越深入，了解越透彻，“知己”的程度就越高。

“知己”的程度越高，“不殆”的把握越大。

所以我们要研究国情、了解国情。

而且要下真功夫。

翻开中国近代史，企图打败列强、富国强兵的人数不胜数。其中，有：维新百日的皇帝；公车上书的学子；力行洋务的官僚和商人；主张实业救国的企业家；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等等，等等。前赴后继，人才辈出。但是，到头来，谁也没有真正找到拯救中国的道路，谁也没有真正成功。

是他们智商不高？是他们学识太浅？是他们能力低下？或许是，或许不是，但肯定不全是。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导致他们失败的诸多复杂因素中，可能有一条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国情

不了解。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没有也不可能走上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真正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

结果就必然是：情况不明，方向错误，一错百错。

百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要说研究中国国情，了解中国国情，最根本的就是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一条真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成功和失败，关键都在于：这条真理是否被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和他们所掌握的深切程度。

当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党的领导还要改进，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完善，人民民主专政还要巩固。我们还有不足，我们还要努力。但，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却丝毫不能动摇。

前段时期，我国发生了一场大的风波。风波的制造者，是极少数阴谋分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

撇开那些蓄意反对共产党、妄图颠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人不说，一些爱国的学生和群众也被卷进了动乱和暴乱中去。他们并不反党，并不仇恨祖国。但一旦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他们的立场动摇了，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感到怀疑了，对西方的一套发生了兴趣。他们爱国，却不那么深切地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他们想把事情办好，却不那么深切地懂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事情才能办好。他们反对腐败，要求民主。这

些都是对的。他们的愿望很好,但最终却不得不吞下被人利用来制造动乱和暴乱的苦果。

他们在根本的原则上发生了动摇,所以事与愿违。

他们所以在根本的原则上发生了动摇,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那么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情。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不论是革命,抑或是建设,不了解国情,便会处于这样的境地。

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国情、了解国情。

所以我赞成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并为之序。

必须在改革开放中 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宣传教育

王福如

在改革开放中要始终警惕和 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

邓小平在谈到为什么北京会发生反革命暴乱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这里讲的大气候，主要指美国插手中国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推行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政治局讨论这个通知时，几位领导同志反复强调，要警惕、要研究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讲到要把整个宣传、思想工作提到反对和平演变这样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来理解、来把握。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研究国际大气候，要抵制和平演变？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孤立的，它是在整个国际环境下进行的。所以，首先要研究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它有什么特点，对我们有哪些有利的方面，又有什么不利的方面。邓小平讲过，从整个国际环境来讲，现在从紧张转向缓和、从

对抗转向对话。这样一个国际环境,对我国改革开放带来许多有利的条件,使我们可以有一段和平时期,能够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但是,我们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也要看到在世界上有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有两种意识形态。这中间的斗争是很尖锐、很复杂、有时很激烈的。正如邓小平在 1989 年 6 月 16 日讲话中所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颠覆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消灭共产主义,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一贯战略目标。从 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目标始终没有变,只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策略。回顾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实施,可以分成三大阶段。

第一个大阶段,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个阶段,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扼杀战略,这时的斗争表现为扼杀与反扼杀的斗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当时资本主义是以英国为首。英国首相邱吉尔就讲,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1918 年,英国纠集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了苏维埃俄国,但是没有得逞,苏维埃俄国把帝国主义的包围打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首相张伯伦采取把法西斯德国进攻的矛头引向苏联的策略,想借希特勒的手把苏联消灭掉。整个苏联展开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西方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也没有成功。

第二个大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1988 年。这一阶段,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可称为抑制战略。这时的斗争表现为抑制与反抑制的斗争。40 年代末,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要防止苏联的势力向外扩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 60 年代,美国在军事上采取进攻的姿态,发动了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在

意识形态上就是搞和平演变。到 70 年代,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跌落下来后,不得不开始在形式上搞缓和,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社会主义国家往来,但是它的目标始终没有变。最早提出和平演变思想的,是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他要在中国培植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就是亲西方的势力。但是明确提出把和平演变作为一种战略来使用的人,还是后来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 1953 年,他提出西方资产阶级的“解放政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被奴役、受压迫的,要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从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必须用“和平解放”的方法,也就是和平演变。针对中国,在 1956 年,他提出要把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当权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后来美国历届的当权者差不多都强调和发挥了这个思想。例如,艾森豪威尔强调了要和平取胜;卡特提出“人权外交”。尼克松曾经写过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这本书集中表达了他的和平演变思想,甚至还提出一个时间表,认为到 21 世纪,资本主义就可以战胜社会主义,世界就应该是资本主义自由世界了。

第三个大阶段,从 1989 年初布什总统上台开始。布什对社会主义国家在战略上又有变化。他提出一种“超越抑制战略”。布什认为,苏联已经提出了政治公开化和新思维,匈牙利、波兰在所谓和平民主化、自由化方面又起了带头作用。而民主自由这股风,已经从华沙刮到天安门广场,吹到了中国。他认为必须抓住时机,推行他的 90 年代新战略。布什推行的这一套战略,主要内容和作法有几个方面。第一,在政治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主要是扶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在中国,他们就支持方励之、刘宾雁这样的政治反对派。第二,在经济上通过援助、贸易加以控制。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开放,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困难,利用有附加条件的贷款、援助方法,想在经济上控制了以后,再推动你在政治上走向自由化。第三,在思想、文化、

意识形态上采取一种攻心战术，武器就是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如广播、报纸、书刊以及吸收留学生、访问学者等等，来兜售、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第四，以东欧为战略实施的突破口。布什一上台，就向国会提出一个文件。文件主要提出要推动东欧和平演变，促使东欧政治上走向多元化，经济上走向自由化，外交上逐步脱离苏联集团。

当前，要讲整个国际大气候，除了美国布什提出的超越抑制战略外，还有西欧的溶合战略，要把东欧与西欧溶合在一起，建立一个以西方人权、民主为基础的欧洲新秩序。另外在李登辉上台以后，台湾也搞了一个“弹性”外交，这是追随美国的柔性战略。

西方这套和平演变的战略，向什么方向发展？这要看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想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这是一回事。另一方面，他们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也不完全取决于他们一方，还要取决于对象国的条件和政策。

美国为什么把它的战略重点放在东欧？他们认为东欧，尤其是波兰、匈牙利有着可以施展他们这种战略的客观条件。波兰、匈牙利在改革过程中社会不稳定，加上他们经济政策上有些失误，通货膨胀加剧，经济上相当困难。

波兰在政治局势上一直很动荡。波兰团结工会在1980年8月工潮中出现，美国一直大力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开始对波兰团结工会采取了一种强硬的态度，不承认他们有合法地位。开始时实行军管，到后来没能坚持下去。1989年年初，波兰开了一个圆桌会议，承认了团结工会有合法地位。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又通过了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定。之后，波兰实行大选，在大选时，团结工会占了多数席位，这超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意料。本来在圆桌会议上达成协议，由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三个党为主来组织政府，但当团结工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后，团结工会就不

承认这个协议，不承认要以共产党为首来组织政府，而要以团结工会为首来组织政府，要把共产党排挤到在野党的地位。无疑，这就不能不使波兰的政治局势很紧张，政治斗争很激烈。

匈牙利在 1988 年 5 月党代表会议上，调整了中央政治局。1989 年 2 月举行的匈牙利工人党的中央全会上，又做出了实行多党制的决定，还为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平反，重新安葬纳吉。现在，匈牙利也成立了一些反对派组织，他们纷纷要求成立政党，以求下一步搞大选。不久前匈牙利又提出讨论修改宪法。在讨论中，关于匈牙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根本的问题，要不要写在宪法里也出现了很大分歧。其中一种意见就是，否定在宪法里写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说美国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东欧，特别是波兰、匈牙利，这是和那里本身的情况分不开的，跟匈牙利、波兰党的政策也分不开。

对于苏联，现在美国一方面对其保持压力，另一方面也希望苏联沿着民主化、公开化和新思维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

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是最后受到民主之风影响的。在这次动乱前夕，他们认为是加速中国民主化的时候了，所以加紧对中国的各种渗透、颠覆活动。在这场动乱之前，已有几次较量。一次是利用所谓西藏问题，利用达赖集团在西藏策动骚乱，然后在国际上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攻击我们，指责我们什么消灭西藏民族等等。再一次是利用魏京生的问题，由陈军牵头，搞了 33 人的签名，要求释放所谓政治犯魏京生。第三次是在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期间，他们策划了一个所谓方励之赴宴未成事件，然后又对此大作文章。但结果，国际舆论对他们不利，说他们在中国这样搞，不尊重主人。几次没有成功之后，他们又抓住胡耀邦逝世后的这次学潮，认为有机可乘，加紧了活动。其中很重要一手，就是利用美国之音，利用美国、香港、台湾的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介，大量造谣，煽动人们起来动乱。实际上，美国是中国从动乱到反革命暴乱

的国外指挥者和策划者。当然，西方国家的这个战略能否得逞，还要取决于我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吃美国这一套，对美国在我国策划动乱、反革命暴乱这种作法，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这使美国、西方很恼火。其后，他们造谣什么“血洗天安门广场”等等，还叫嚷要在经济上制裁中国，在政治上孤立中国。无论如何，美国确实感到它的这一套战略在中国受到很大的挫折。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资金，要跟西方进行贸易，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但在同时，一定要警惕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特别在思想文化上要划清界限，抵制他们那些腐朽的东西、没落的东西。我们搞意识形态工作，搞思想政治工作，搞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把警惕和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方针，把我们的工作提到跟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作斗争这样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来规划。第二，我们一定要做好自身的、国内的工作，来消除引起动乱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同时要更好地发扬民主、反对腐败、制止通货膨胀、解决分配不公等问题，消除引起动乱的因素。外国对我们怎么样，他们来不来做生意，跟不跟我们打交道，以及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能不能得逞，最根本地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我们是否强大，是否有免疫力和抵抗力。第三，要注意研究、借鉴国外的经验，特别是要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在当前，要注意研究苏联、东欧搞改革开放中有些什么成功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又有哪些失误和挫折，是前车之鉴。这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中要始终坚持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四个坚持”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改革开放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条就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直不断，时起时伏。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五个回合。

第一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就在这时，有些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开始露出苗头，一方面表现在社会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党内。在社会上，出现了北京的“西单墙”、上海的“民主广场”、贵州的“启蒙社”等等。北京“西单墙”贴出了大小字报，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指向党的领导、指向人民民主专政。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同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划等号。1985年，邓小平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指出，有些人借着批“极左”，来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在党内，1979年2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露出不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对此，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当时，我们党还把主要精力用来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但邓小平高瞻远瞩，及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我们的立国之本。实践证明，这是英明之举。

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给予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严正警告。为了将拨乱反正的工作进行到底，分清历史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党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在这个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

一次露头，特别是集中表现在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上。甚至还有人要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部历史，不但“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要否定，连“三大改造”也要否定。这实际就是说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必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领导都是错的。针对这个思潮，邓小平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连续讲了几次话。主要是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起草并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在1981年8月，我们党组织召开了思想战线座谈会。在会上，邓小平批评了《太阳与人》（剧本：《苦恋》）这部电影。指出这部电影的要害是丑化共产党。《决议》和座谈会，又一次给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反击。这是斗争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并没有对党的批评善罢甘休。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从理论上做文章，提出抽象的人道主义，宣扬所谓的社会主义异化论等等，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历史必然性，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必然要异化、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还有人把党的领导和民主对立起来，提出民主就是大家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指导干什么？更有甚者，在新闻理论上，有人提出单有党性不够，还要有人民性来补充和制约党性。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有些人把民主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人民性的问题上，散布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不久前发生的动乱中，一些新闻单位正是受了这一套思想的影响，造成舆论导向的严重错误。要知道这种理论在那个时候就已提出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除了向理论方面发展外，另一方面又向文艺方面发展，使精神污染、“精神鸦片”泛滥成灾。1983年前后，各种黄色的录相、不健康的小报和刊物到处泛滥，毒害人们的灵魂，特别是毒害青少年。也

正是在那个时候，邓颖超发出要救救孩子的呼吁。为此，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党在思想战线和组织战线上的任务》的报告，一方面提出要整党，另一方面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遗憾的是，主要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人的态度不坚决，这场斗争不了了之。

从清除精神污染以后，一直到1986年底的学潮、1987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第四阶段。清除精神污染没有搞下去，相反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力量很大，说你搞糟了，搞错了，要为所谓人道主义、异化翻案，为受批评的人翻案。这一段的一个特点就是大讲抽象的自由。这集中地表现在第四次作家协会代表会上大讲自由，如创作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在这次会上，刘宾雁这样一个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被选为全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刘宾雁的东西受到吹捧。在新闻上，原来提过用人民性制约党性的人，这时又转过来大讲新闻自由。正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结果，导致了1986年底的学潮。当时的学潮，从安徽的科技大学开始，集中提出的口号就是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套东西。邓小平严肃批评了当时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软弱、涣散的态度。不仅如此，还从组织上开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

从那以后到不久前的动乱、反革命暴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第五阶段。这一阶段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组织上实际形成了一个集团，二是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化。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可以说已经有组织、有纲领、有舆论阵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势力，只是在名义上还不叫什么党或是什么组织。那些人经常以各种方式活动，搞各种集会、沙龙，经常邀请一些理论界、文艺界的人去

座谈。另外他们有舆论阵地，实际上控制了一些报刊。在这些报刊上，他们的文章很容易照登，而反对的文章就很难登。说他们有组织、有纲领、有舆论阵地，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集团，这一点他们自己也不否认。方励之就在香港《明报》发表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中讲，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然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量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形已经出现。方励之将其称之为压力集团，对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种集团的一个特点就是受到国外的支持，特别是跟美国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这一阶段，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除了实际上形成集团外，另一个特点是使理论更加系统化。他们提出各种理论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首先，他们提出一整套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比如一种理论叫“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革命，不适用于建设，所以现在要发展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还有更坏的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对建设没有用，对革命也没用，所以连指导革命的作用也给否定了。再一种理论叫“多元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千千万万种学派中的一种，意思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能指导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学派，马克思主义外部又有各种不同的学派，以此来割裂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甚至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学派也承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来歪曲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种理论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把发展和坚持对立起来。他们把一些基本原理给否定了，然后用他们的一些“新”东西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以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

其次，他们提出各种理论，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我们40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诬蔑为